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

史甄陶◎著



上海
著名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

史甄陶◎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栌为中心/史甄陶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675 - 0185 - 0

I. ①家… II. ①史…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徽州地区—元代 IV. ①B24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5753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栌为中心

著 者 史甄陶
策划组稿 朱杰人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李海燕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封面绘图 陈书毅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阴市天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0185 - 0 / Z · 047
定 价 3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序

史甄陶博士是相当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她的问题意识强，往往能从无问题中找出问题来。她于1994年6月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随即考入该系硕士班，受教于林聪舜教授门下。1998年1月以《薛瑄之复性说及其影响》一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8月应聘为中国海事专科学校（现改名台北海洋技术学院）专任讲师。尔后考上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班，继续接受林聪舜教授与祝平次教授的指导。2009年1月，以《元代前期徽州朱子学——以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一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2月，至2010年12月，担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工作，再度接受祝平次教授的指导。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师从杨晋龙教授，研究元代《诗经》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以上是甄陶求学的历程。

甄陶的学经历不只上述这么简单而已，她从读硕士班起到目前的学经历可以说有三多：一是大陆经验多，二是得奖助金多，三是著作多。兹先从第一点谈起。甄陶到过大陆前后有九次，其中有四次最为重要。

（1）1995年，甄陶还是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硕士生时，就应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和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之邀，赴大陆访学，并经二位教授介绍，拜见了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和陈来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蒙培元教授等人。

(2) 1998年,与台湾大学张永儒教授,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朱自力教授、吕凯教授、耿湘沅教授,辅仁大学的邬昆如教授、黎建球教授等等,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关于谭嗣同思想的学术讨论会。

(3) 2005年,得到中国发展基金会补助,赴安徽合肥安徽大学哲学系,作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在此期间,赴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抄写数据。

(4) 2012年,参加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的“两岸文化研习营——徽州”,并赴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收集资料。

这几次经验使她对大陆的重要学者,以及与徽学研究相关的图书馆,有相当的了解,有助于她在研究资料上的搜集。

第二是奖助金多。在近十年中她得到四次奖助的机会,赴大陆和日本从事学术交流。

(1) 2004年中华发展基金会奖助,赴大陆地区作研究。

(2) 2005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撰写论文奖学金。

(3) “国科会”95年度(2006)奖励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候选人撰写博士论文奖学金。

(4) 2011年11月6—19日,担任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

第三是著作多,与宋、元有关的论文有下列数篇:

(1) 《论饶鲁与朱熹对〈中庸〉解释的异同》,《思辨集——第十二届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会议论文集》(第九集),2006年10月。

(2) 《论〈在兹篇〉的“道”与“文”》,《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

(3) 《从〈感兴诗通〉论胡炳文对朱学的继承与发展》,《汉学研究》第26卷第3期2008年9月。

(4) 《论朱熹与崇安刘氏家族的往来》,《史汇》第15期2011年12月。

(5)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的体例及对朱熹〈诗集传〉的评议》,《东洋文化研究》第15号,2013年3月。

各篇论文都有甄陶的新见解,也开拓了研究的新论题,可作为后辈学习的地方不少。另外,如《陈子展研究〈诗经〉方法述评》、《东亚儒家静坐研究之概况》也都对学界有所帮助。

甄陶之所以能达到三多,是她长年认真治学的成果,我们由衷地敬佩。她的博士论文经过仔细修改,改名为《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栌为中心》,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复观教授在他的《中国经

学史的基础》序文中说：“经学史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二是经学在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已有的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已不足以窥见经学在历史中的意义。”（《序》，页 1）甄陶这本博士论文，结合思想史与经学史，构成一部有形骸也有血肉的著作，大家读了就可以印证我的话。

甄陶来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期间，协助经学文献研究室整理 2010 年 7 月本所与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合作，在该校召开的经学会议论文集《正统与流派——历代儒家经典的转变》，态度积极，勇于任事，查证引文资料，补充批注，巨细靡遗，颇得本所同仁的赞赏。甄陶要我为她的大作写一篇序，我义不容辞，把她的学经历略述如上，权充一篇序。

2012 年 12 月 30 日林庆彰志于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501 研究室



导论

本书主要关心的是元代前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如何被继承与发展。以当时三位徽州学者——胡一桂(1247—1315)、胡炳文(1250—1333)和陈栎(1252—1334)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的重点则是环绕着“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三方面。

一般而言,朱子学在元代的发展情况,相较于宋代和明代,是学界比较少注意的议题。过去曾有一些说法认为,元代朱子学只不过是宋代的复制,乏善可陈,或者认为朱子学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发展停滞。也有学者意识到元代在思想史研究上的空缺,故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朱子学如何进入中国北方,进而成为元代官学的过程。但是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而正式开科取士是在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这期间将近有四十年的时间,朱子学正处于失去国家力量支持的状态,同时,关于元代朱子学的研究,也不该仅从朝廷政权的角度观察,需要注意在中国各地都有传承的历史事实。所以,本书选择徽州地区为主要讨论的对象。

以往研究元代朱子学在地方上的发展,多半集中在金

华、江西,^①以及福建。^②徽州相对而言较不受到注意。^③然而,元代徽州地区的朱子学,其实也有相当丰富且重要的表现,这点可由顾炎武提供的线索来看。顾炎武谈到明代《四书五经大全》的数据源时,说到《四书大全》所依据的是倪士毅的《四书辑释》,而此书主要是合并陈栎《四书发明》与胡炳文《四书通》而成的。此外,顾炎武认为《诗传大全》“全袭”刘瑾《诗传通释》,^④而《诗传通释》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相关。他同时也谈到《周易大全》中收录了胡一桂和胡炳文的《易》学见解。顾炎武提到的现象,正说明了元代徽州学者对朱子学的讨论,的确对明代官方所认定的朱子学有所影响,并且几乎都与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有关。再进一步探询,胡炳文和胡一桂都是徽州婺源人,陈栎是徽州休宁人,他们三人生存活动的范围主要以徽州为主,^⑤彼此往来密切,在学问上互相砥砺影响。从现今所存留的文集来看,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常在书信中讨论朱子学说,并且各自衍生出形态相同但内容不同的著作。例如胡一桂曾将自己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和《易辩》等书寄给陈栎,请他指正;胡炳文也曾通过胡一桂,将《四书通》寄给陈栎,而陈栎此时也完成了《四书发明》,在信中他们互相讨论;陈栎也受到胡一桂的影响,将早年写的《书解折衷》改为《书经蔡氏纂疏》,并且,陈栎因为不满于胡一桂所著的《史纂通要》和《古今通略》,所以再写了一部《增广历代通略》。所以本书想要对这三个人同时进行研究,一方面观察徽州的地方文化对他们学习的养成有何影响,另一方面也探究他们共同关注朱子学说中的哪些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各自又提出什么样的解决之道。希望藉由研究这个学术群体,并从他们互动的讨论中,厘清朱子学在元代前期徽州地区发展的特色和风貌。

① 笔者认为金华和江西最受前辈学者的重视,是因为他们过分看重黄榦的重要性,将黄榦视为朱子之后唯一的代言人,将其所传承的金华四先生视为学术的正统,如此便抹杀了朱熹的学生分散在各地所造成的影响。而黄榦将朱子学说传到江西的这支,经过饶鲁至吴澄的发展,探讨的焦点则在朱、陆合会的学统。

② 关于福建朱子学的研究,目前最主要的两本书是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和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福建是朱熹讲学和生活最久的地方,所以当地的朱子学发展有相当的成果。在元代这个阶段,《福建朱子学》以熊禾、陈普和吴海为主要讨论对象,侧重于他们在元代隐逸山林的处世态度,以及哲学思想。《闽学源流》对元代福建地区朱子学的发展,只有不到一节篇幅的概括性介绍。

③ 徽州地区现今位于安徽省南部。晋朝时期称之为新安郡,故又名新安。北宋时期称之为歙州,后改名为徽州,属江南东路。元朝时期升徽州路,属江淮行省,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元贞元年(1295)升婺源县为婺源县,为属州。婺源于1934年之后,划归在江西省境内。

④ 顾炎武《四书五经大全》,《日知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八,页13-14。

⑤ 本文所讨论的地区主要是徽州的婺源和休宁,但是胡一桂在徽州任教并结交各地的学者;胡炳文经营的明经书院,四方从学者甚众;陈栎则与徽州地区有名望的士人往来。他们所联结出的学术网络,并不仅限于婺源、休宁两地,故以“徽州”作为本书讨论之区域的统称。

本书设定的时间断限在元代前期,主要是根据这三位学者的卒年为主。胡一桂过世得较早,陈栎则过世于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晚胡炳文一年。这三人出生的时间相近,在青年时期都经历了南宋的灭亡和科举的废除,并且大半生都处于元朝统治阶段,特别是陈栎与胡炳文在元代科举恢复之后,仍然继续从事学术活动,所以想要了解科举废除之后到元代科举恢复之间,朱子学为何能在地方上传衍不绝,以及科举恢复之后又如何被继承与发展,这几位学者的事例正可说明朱子学在时代变迁下之所以存续的条件和情况。

至于本书为何要从“家学”、“经学”和“朱子学”这三个层面来谈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的学术特色?这主要是综合前人的评论,以及观察元代徽州学者发展学术的实际形态而来。“家学”指的是家中世代相传的学问。徽州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宗族为主,而这三位学者的成学条件都与其家族有关,所以“家学”成为观察他们传衍朱子学的重要环节。至于“经学”的问题值得关注,主要是因为黄百家曾说到元代徽州具有“文献蒸蒸”的特色,^①而全祖望则批评“渐流为训诂之学矣”。^②虽然这种继承朱学的方式,正是明代以后学者从义理的角度所无法欣赏的,^③同时,这种方式也未必不存在对义理的思考,但是,这也反映出朱子学在元代徽州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在经学著述上面,这正是了解他们学术观点的重要凭借。至于清代四库馆臣,则认为胡炳文和胡一桂等人是碍于“门户之见”的学者,^④这样的论断,明确说出元代徽州学者的朱子学立场,却容易使人忽略他们对朱子学说的修正与讨论。所以如何不受到明、清学者负面评价的影响,重新看待元代徽州地区朱子学者的学术贡献,是理解朱子学发展不可避免的要點。

一、主题与方法论

(一) 研究概况

有关元代前期徽州地区的朱子学研究,目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区域学术史,一是经学研究。

① 黄宗羲《沧洲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卷六十九,页2279。

② 黄宗羲《介轩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九,页2970。

③ 明代倡议朱学的薛瑄曾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张廷玉《明史》卷282,页7229。)至于反对著述的原因,薛瑄说:“各《经》、《四书》注脚之注脚太繁多,窃谓不若专读各《经》、《四书》正文、传、注,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注脚太繁多,不惟有与经、注矛盾处,亦以起学者望洋之叹。”(《读书录》,《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卷四,页1123。)薛瑄的说法,反映出明代学者对元代继承朱学方式的批评。

④ 四库馆臣说:“盖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于授受源流,辨别尤甚。”(见胡一桂《易附录纂注·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1。)

从区域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元代朱子学的发展问题,^①有别于仅以官方正统学说为主的切入点。^②在区域学术发展的研究中,涉及元代徽州地区讨论的有马渊昌也的《元·明初性理学の一側面》^③,作者强调徽州与金华一样,同是南宋以后朱子学发展极为兴盛的地区,并且列举了这个时期徽州十位学者对朱学的看法,此文明确地提示出徽州是元代朱学发展的重要区域。朱鸿林也曾提到元代徽州学术问题值得研究。^④再者,从“新安理学”的角度,^⑤谈徽州地区的学术发展,也有数篇概论性的文章,^⑥而周晓光所著的《新安理学》,^⑦可说是综论宋代到清代徽州地区理学发展的第一本专书。从宋到元这个阶段,他认为徽州理学在南宋属于形成期,到

-
- ① 从区域的角度探讨元代学术发展的问题,主要以孙克宽、陈荣捷为代表。他们都注意到朱子学在北方的传承与在南方的传承有所不同。而其主要的观点除了顾及朱子学在北方金朝和蒙古朝廷是如何受到重视之外,同时也注重朱子弟子黄榦所延续的学脉,特别是在金华和江西所造成的影响。孙克宽在元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计有:《元代金华学术》(台中:东海大学出版社,1976);《元初儒学》(收于《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页109—209)和《元代北方之儒》(收于《元代汉文化之活动》,页209—236。)陈荣捷的研究则是以《元代朱子学》《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页299—329)为代表。
- ② 这一类的研究,主要以狄百瑞所提出的《元代新儒家正统思想的兴起》为代表。(上篇《思与言》第21卷第1期,页43—57。中篇《思与言》第21卷第2期,页113—246。下篇《思与言》第21卷第3期,页315—335。)作者的观点是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刘秉忠、姚枢、窦默、郝经和许衡等人相继推动朱子学说,一方面使得元朝当局接受学堂和科举的制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对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压力下,这些学者特意关注朱子学中道德修养的部分,而忽视对事务之客观研究,进而使得四书受到格外的重视。狄百瑞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朱子学在异族统治下所受到影响和产生的转变,但是作者主要还是从国家政权的观点,考虑学术的发展问题。他约略提到吴澄对朱学的看法与许衡不同,其实就已经反映出当时朱子学发展的多样性,只是他并未加以着墨。
- ③ 马渊昌也《元·明初性理学の一側面》,《中国哲学研究》1992年第四号,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页60—131。
- ④ 朱鸿林《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间与进路》。这是2007年3月30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研究室的演讲稿。网址:<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640>
- ⑤ “新安理学”的概念主要是将徽州的朱子学视为一个“学派”来了解,基本上这是明代程瞳在正德年间(“序”成于正德三年[1508])编著《新安学系录》的观点。这个名称首见于明中叶万历年间朱升(1299—1370)《朱枫林集》的扉页。清代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四库存目丛书》子155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1995)卷十一,页1—14)时,也明确地使用这个名称。但是本书主要是探讨朱子学从南宋到元代在徽州地区的发展,着重在呈现其动态被讨论的过程,并且在宋至元代,当地的学者并没有使用过这个名称,所以本书也不使用。
- ⑥ 这些文章有:赵华富《元代的新安理学家》(《学术界》1999年第3期[总第76期],页66—71);李霞《论新安理学的形成、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页95—102)和《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9卷第2期,页26—28);王国良《朱熹与新安理学》(《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页107—111);陶清《“求真足之归”与“求是”——新安理学思想理论特色及其治学特点初探》(《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页112—115);靳友霞《论新安理学的家学传统》(《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9卷第2期,页103—108)。此外,王国良编有论文选集《新安理学与宋元明清哲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但是这本书中,仅有王国良《朱熹与新安理学》一篇,对宋元时期有关的徽州学者有简略的介绍。
- ⑦ 周晓光《新安理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了元代则是发展期。在元代的部分,周晓光主要关注当地学者的学术活动、政治态度与学术内容简介,重点大多出自明代程瞳《新安学系录》及《四库全书总目》。由周晓光所指导的苏惠慧硕士论文《元代新安理学研究》,^①主要考察元代新安理学的基本风貌、学派特征和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其中对陈栎的讨论较为仔细。周晓光的另一部书《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地理研究》,^②则根据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讨论徽州学术文化区的形成与变迁。这项研究不仅顾及了徽州从南宋到清代文化风气的转变,同时也呈现了徽州六县之中,学术文化中心区域扩张的情况,对于从空间的角度理解徽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所帮助。此外,解光宇针对宋元时期徽州地区的理学家,进行个案研究,^③较偏重在哲学的讨论。刘成群在《元代新安理学的四个“转向”》^④中,将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视为新安理学群体第一期代表人物,并与郑玉、赵沍和朱升等第二期人物对比,认为两者之间发生了四个“转向”:从“宗朱”到“和会朱陆”,从“附录纂疏”到“求真”,从《四书》、《易》学到《春秋》学,从生命体验到“以道自认”。就两代学者之间的比较而言,或许有这样的趋向,但是若将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三个人相比较来看,这样的讨论有失笼统。第三,从教育方面探讨朱子学在徽州的社会作用,最重要的是刘祥光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世地方教育的发展:徽州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1100—1800)》一文中^⑤,提到因着科举制度的缘故,南宋时徽州出现官设的小学,同时专门为着训蒙而编写的教科书也应运而生。到了元代,他以陈栎的事例说明徽州地区的蒙学情况,同时也注意到胡炳文对童蒙教科书的编写,凸显出这些学者在从事朱子学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

从经学研究的角度,探讨胡一桂、胡炳文与陈栎等人的贡献,目前也累积了一些研究成果。属于概论性质的有周春健的《元代新安学派的四书学》一文,^⑥他以胡炳文、陈栎与倪士毅为代表,注意他们在体例上与《纂疏》、《集成》同样采取“集编体”的方式,但是在内容上则坚持排斥异说,门户色彩更浓,并影响了明代《四书大

① 苏惠慧《元代新安理学》,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② 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地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③ 解光宇《论新安理学家程先、程永奇父子》(《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9卷第1期,页12—15);《论新安理学家程洵》(《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8卷第4期,页11—14);《论朱升理学思想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1卷第2期,页7—11);与朱惠莉合著《郑玉“和会朱陆”的影响及其思想》(《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第21卷第4期,页11—13)。

④ 刘成群《元代新安理学的四个“转向”》,《汉学研究》2011年第29卷第4期,页167—200。

⑤ 刘祥光《中国近世地方教育的发展:徽州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1100—180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页1—45。

⑥ 周春健《元代新安学派的四书学》,《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页114—120。此文也收录在周春健《元代四书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281—300。

全》的编纂。关于胡一桂的研究,林忠军的《胡一桂象数易学思想》主要探讨胡一桂在象学、数学和易学史三方面的成就^①;其所指导的李秋丽博士论文《胡一桂易学思想研究》则是有系统地探讨胡一桂如何弘扬朱子《易》学。^②钟彩钩在《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对朱子〈易〉学的诠释》一文中则主张胡方平和胡一桂的贡献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在思想上胡氏父子强化伦理的观念,在内容上则是以朱子经注为中心,注意各种歧解间的抉择与会通,并且整理以卜筮为中心的《易》学通论或《易》学史。^③此外,许维萍的博士论文《宋元易学复古运动》已经注意到胡一桂对古《易》的看法有别于朱熹。^④关于胡炳文《四书通》的研究,则有佐野公治和廖云仙两位。佐野公治认为胡炳文《四书通》的特征之一,主要是删除了《四书集编》和《四书纂疏》所采用的“或问”,并且也节略诸儒之说;特征之二则是他使用淳佑系统本。此外,胡炳文在书中增补了朱熹加以取舍的北宋学者言论,同时也采用与朱熹学说对立的张九成、陈亮、叶适和陆九渊弟子的观点,可见此书呈现了南宋以来学派融合的特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⑤廖云仙则从胡炳文《论语通》的体例、特色以及影响三个方面,说明胡炳文不仅尊奉朱子,视《四书集注》如经之外,同时在引述诸家解说时,也是采取纯化《集注》的态度。^⑥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胡炳文对朱熹的反省。高新满的硕士论文《胡炳文易学思想研究》^⑦则是关注胡炳文治《易》虽以朱熹《周易本义》为蓝本,但同时也采取其他儒家经典作为诠释的方法。此外,作者也注意到胡炳文对《周易》的独到见解。关于陈栎的研究,则有许华峰的《论陈栎〈书解折衷〉与〈书蔡氏传纂疏〉对〈书集传〉的态度——驳正》^⑧和《从陈栎〈定宇集〉论其与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的关系》^⑨,以及苏惠慧的《论新安理学家陈栎》^⑩。许华峰对陈栎的研究,集中在《书解折衷》与《书蔡氏纂疏》的问题上。他厘清了陈栎这两部书之间的关联以及完成刊行的经过,也提出陈栎虽然完成的时间分别在科举恢

① 林忠军《胡一桂象数易学思想》,《象数易学发展史》(济南:齐鲁书社,1998)第十四章,页472—501。

② 李秋丽《胡一桂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

③ 钟彩钩《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对朱子〈易〉学的诠释》,收于杨晋龙主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上册,页195—235。

④ 许维萍《宋元易学复古运动》,东吴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0。

⑤ 佐野公治著,张文朝译《〈四书〉注释书的历史》,《经学研究论丛》(台北:学生书局,2001)第九辑,页251—253。此文收于佐野公治《四书学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页234—236。

⑥ 廖云仙《胡炳文〈论语通〉》,《元代论语学考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第六章,页349—393。

⑦ 高新满《胡炳文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⑧ 许华峰《论陈栎〈书解折衷〉与〈书蔡氏传纂疏〉对〈书集传〉的态度——驳正》,收于杨晋龙主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页395—424。

⑨ 许华峰《从陈栎〈定宇集〉论其与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的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8年第8卷第2期,页61—74。

⑩ 苏惠慧《论新安理学家陈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3卷第3期。页277—282。

复之前与之后,但是想纠正蔡沈《书集传》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而陈栎之所以要纠正蔡《传》是为了要补其不足,主要还是在尊敬蔡沈的角度上进行。而苏惠慧的论点则放在陈栎对朱子学说继承的态度上,强调陈栎注重《尚书》和《大学》,同时也吸收了其他经学家的见解。

上述这些著作,对于探讨朱子学从南宋到元代徽州地区的发展,皆有贡献。但是也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提出来反省。首先,过去对于元代徽州朱子学的研究,多半重视他们“述朱”的特性,但是这只能看出他们与朱子学说密切相关,却不能解释他们采取这种立场的用意,也凸显不出他们对朱子学的反省与检讨。所以,若是能从历史的角度,实际地探究这些学者在倡导和研究朱子学时,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以及修正了朱熹的哪些观点,便能够看出他们在朱学上具体的成就为何,也能够跳脱现有学术视角的盲点。

其次,相较于汉、唐经注,朱熹以“理”的概念重新建立了一套对经典解说的方式,其表现不只在内容上,同样也在形式上。但是过去的研究成果,多半关注朱子学者对经注内容的补充和说明,却忽略朱熹的解经方式以及《经》书整体架构的问题。这也应该是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因为朱熹自己在著述时,相当注意《经》书的架构和表现的形式,譬如他称《大学》、《中庸》为“章句”,而称《孟子》、《论语》为“集注”。^①又如朱熹主张《周易》应该呈现“分经异传”的方式,这些例证就说明他对经、传编次十分重视。同时,朱熹在《易》图的表现手法以及解经的要诀上^②,也有其独特的方法。这些问题过去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然而对于宋元以来继承朱学的学者而言,他们的确相当重视,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对于朱子学的继承,也不只在经学的问题上^③,但是过去的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看到朱子学在文化上的影响力。综观元代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除了整理经学的注疏之外,同时也有史学和文学的著述,那么,他们如何拓展朱子学到经学之外的领域,使得原本不受理学青睐的范围都能为朱子学发言,这点需要再加以探究。

① 四库馆臣为《四书章句集注》所撰的“提要”中说:“《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袁八家之说称‘集解’也。”(纪昀等《四书章句集注·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7册,页1—2。)

② 钱穆《朱子论解经》(上)(下),《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82)第四册,页231—300。

③ 关于朱熹对宋元以后,在文化上所造成质变与面广的影响,杨儒宾说:“朱子对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这种影响不只是量的普及,而且与前代中国文化的表现作一比较,我们还可说其影响造成了性质上极大的转换。……朱子以后的经学,我们可以说是天理观所展现的儒家诠释学,朱子以后的历史哲学、文学批评、政治思想等等,我们无一不可视为‘天理’此概念的分殊性展现。”(“导论”,《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页2。)

总之,过去的研究成果已经陈明了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等人,在徽州地区积极推广朱子学说,并且在经学领域成绩辉煌,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实际从事于朱学时所考虑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现在仍然所知不多,如此就很难从当时的眼光了解他们学说的价值。所以本书以前辈学者们的研究为基础,更进一步从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的文集和著作等资料着手,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元代前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发展的特点和成果。

(二) 以“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为焦点

若要探询元代这些学者为何在南宋灭亡之后,仍旧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从他们的成学背景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的学术资源与宗族文化关系密切。因为宗族是徽州社会组成的基本结构,也是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力量,所以即便朝代更迭,朱子学在徽州地区仍然能通过宗族成员之间的传递,延续其影响力。同时藉由观察他们扩散出去的交游范围,自然可以勾勒出地方社会的人际网络。所以从家族学术传承——“家学”的角度观察元代前期朱子学的发展问题,可以看见相对于中央朝廷的元代地方社会在学术文化上旺盛的活动力。

这三位学者所在的宗族之所以会有朱子学的传统,主要是因为南宋后期,国家逐渐提高朱熹的地位,而徽州是朱熹的家乡,当地士人开始将朱熹视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表征,所以更加关注和发扬朱熹的学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徽州自北宋以来就是经学发达的地区,^①并且南宋朝廷在朱熹歿后,并未将他所有的著述都纳入学官,^②因此当地的士人对于宋代及其之前的其他经学研究成果,同样加以关注。所以,观察这三位学者的家学传承时,不能单纯地只从朱子学的内部来看,也要注意当时各种重要的学说,无论是汉唐经注,还是南宋时其他学者的观点。当然,朱子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元代学者同时还要面临着朱熹著作版本不一、南宋以来的朱子学者对朱熹学说理解不同这些众说纷纭的情形。所以本书将从“朱子学的经学化”与“经学的朱子学化”两方面,来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前者主要是探讨元代徽州学者如何在著作上,提升朱子学的地位,主要是谈著作形式的问题;后者则是观察元代学者如何取舍朱熹的经学见解以及传统汉唐的注疏观点,偏重经注内容的研究。希望藉由这两方面的讨论,研究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三人,看待朱子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以呈现元代前期徽州学者对“朱熹”不同的理解和发展朱子学的特色。

① 方岳(1199—1262)说:“吾州以经名家者多矣,《书》为最。”(《滕和叔尚书大意序》,《秋崖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三十六,页34。)

② 《宋史》中记载:“熹歿,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杨家骆主编,脱脱等著《宋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四百二十九,页12769。)

本书同时也关注胡一桂等人如何将朱子学的影响力,遍及经学之外的领域。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下,经学、史学和文学仿佛不相干涉,但是从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的著作目录来看,很容易就发现他们并不是这样来看。他们不仅关注经学的朱子学化,同时也试图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力,欲使朱子学适用于整体学术体系。所以,实在需要留意胡一桂等人如何将朱子学的观点,从经学拓广到诗文和历史等不同的文化领域,如此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元代朱子学的发展面貌。

总之,过去的研究多半仅从性理学的角度赞扬朱子学的价值,却无意间忽略了元代这些学者的努力。本书则是希望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试图回到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所面对的处境,来了解当时他们对朱子学的观点,以及扩展朱子学的用心,藉以呈现出元代学者心目中的朱子学特点,以及朱子学在元代绵延不绝的活泼动力。

二、本书各章简介

本书就上述的研究重点,分别观察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这三位主要的人物。以下简介各章节的内容:

第一章的重点是探讨南宋时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传播与发展的情况,以作为元代前期徽州朱子学的背景介绍。本章首先探讨的是朱熹生前,其学说如何传入徽州,然而徽州此时又有哪些重要的学者和学说受到重视,并且从朱熹和他的表弟程洵的通信中,具体了解朱熹在当时的论学重点,以及程洵的反应。其次则是观察朱子死后,徽州地区接受朱学的学者,与朱熹生前相较,在身份和地位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并且以当时著名的朱子学者许月卿来看南宋朱熹歿后,所谓“朱子学”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方式为何,以此作为元代朱子学发展的对照。

第二章探讨的主题是胡一桂。胡一桂因为生存于元代科举恢复之前,所以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放在他在当时钻研朱子学的动机,以及他与家族、乡里其他地区的士人交往互动的情况,以了解他在当时发扬朱子学的背景。其次则是探讨胡一桂在朱熹《易》学上的继承与创新,主要是从他在《周易》体例的编排,以及对《易》图的解释与制作两方面,来看他与朱熹观点的异同之处。第三部分则是讨论胡一桂在《诗集传附录纂疏》中,自己又是如何藉由“附录纂疏”的体例,作为提升朱熹《诗集传》解经地位的一种手段;但是,朱熹对《诗序》的观点,以及在《诗集传》中所表达的“天命”思想,胡一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第三章的重点则是以胡炳文为中心。首先是讨论他如何藉由家族力量,经营明经书院,并且藉由书院课考的事件,来看他如何推广其学术理念。再者探讨胡炳文对朱熹经注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是从胡炳文对南宋朱子学者饶鲁的批判入手。胡炳文在《四书通》的凡例中,直接指明南宋时期被视为朱子学者的饶鲁与朱熹的

观点不同,所以本文一方面想了解他反驳饶鲁以护卫朱熹的学说,涉及哪些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想探讨,饶鲁在胡炳文所理解的朱子学上,造成什么影响,藉此反映出南宋朱子学者的意见不容小觑。最后,本章研究胡炳文所著的《感兴诗通》一书,想了解胡炳文如何将朱子学的影响力涉入诗文领域。胡炳文在此书中汇集南宋以来十位学者的批注,利用纂疏的手法整理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从他择取注家来看,胡炳文支持南宋蔡氏家族及其朋友对朱熹的解释,而不采用黄榦和何基等人的意见。胡炳文试图将此组诗提升至经典的位置,所以在解释这二十首诗的义理脉络时,扣紧《中庸章句》的架构,并且也刻意采取朱熹的解经手法。同时,胡炳文认为朱熹此诗内容的重点在“明道统、斥异端、正人心、黜末学”,所以对这四个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四章则是以陈栎为讨论的焦点。本章首先同样也是关心陈栎在学习朱子学时,家族和师友对他有何影响;并且为什么在科举废除之后,他仍然关注朱子学;还有当他面对当时流行的风俗文化等问题时,又是如何重新检讨和应用朱子的学说以作为响应。其次则是从陈栎和胡炳文针对朱熹《四书》版本差异所起的争论入手,进而讨论及呈现陈栎看待朱熹的立场。通过这样的比对,可以看出陈栎希望呈现的是一个重视“经文本身”的“朱熹”。同时,虽然他自认其解说在朱学的范围之内,但是仍然主张“以经解经”的原则应优先于朱熹的经注。最后则是探讨陈栎如何将朱子学思想延伸至史学著作上。陈栎受到胡一桂的刺激,著有《增广历代通略》一书,为要达到“以经之道断史之治”的理想,使得道学不落入清谈,能有所应用,以凸显“经与史合”的样貌,所以陈栎在编写这部通史时,特意将伏羲作为三皇之首,有意将政统的开端与道统的起始合而为一。同时他在书写宋代历史的问题时,也着重从圣王的角度描述赵匡胤,并且认为宋代在神宗之后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道学家不受到重用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陈栎如何将道学的观点反映在历史叙述之中。

第五章则是结论,综述以上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以此为基点,将研究延伸至元代后期徽州朱子学的讨论,以及元代其他地区朱子学的研究。最后还有一篇附录,主要考证和研究目前上海图书馆所藏,作者署名为胡一桂的道学文献选编《在兹篇》,试图理解作者如何在尊重朱熹的道学理念下,又能在文学的领域延伸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因为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只有序言中的内证,目前并没有其他的书籍注录过这部书,故无法完全确定作者是否真的就是婺源胡一桂,所以将这篇文章放在本书的最后,期待有新的材料能够作进一步的佐证、说明。希望藉由本书的研究,可以凸显朱子学在元代徽州地区的活泼动力,激发出元代朱子学在研究上更多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



目录

导论 / 1

第一章 南宋徽州地区的朱子学 / 1

第一节 朱熹与徽州士人的交往与论学 / 1

第二节 庆元党禁之后的发展 / 25

第二章 胡一桂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 / 36

第一节 家学与交游 / 36

第二节 对朱熹《易》学的探讨 / 49

第三节 对朱熹《诗集传》的注释与评议 / 65

第三章 胡炳文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 / 82

第一节 明经书院与朱子学的传承 / 83

第二节 《中庸通》对饶鲁的批评与吸纳 / 99

第三节 《感兴诗通》与朱熹《斋居感兴》的比较研究 / 111

第四章 陈栎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 / 130

第一节 反思朱子学 / 130

第二节 从《四书》的版本问题论陈栎对朱熹的认识 / 151

第三节 《增广历代通略》的史学观 / 165

第五章 结论 / 178

附录 论《在兹篇》的“道”与“文” / 187

参考书目 / 205